

“偶像养成类节目”停播，综艺节目再度进入黄昏？

随着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发布，以后各平台的“偶像养成类节目”不得播出，同时不能再播出的，还有明星子女参加的综艺娱乐及真人秀节目。

明星子女过多地参加综艺真人秀，的确对少年儿童成长有不良影响，那么“偶像养成类节目”被停，会获得公众支持吗？从社交媒体的反应来看，大多数网友对此持赞同态度。从散发着青春气息、令人眼前一亮的综艺形式，发展到今天被明令禁止，偶像选秀节目何以到了这个地步？

在广电总局《通知》发出的几天前，爱奇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龚宇便宣布了“取消未来几年偶像选秀节目”，作为《偶像练习生》《青春有你》等知名偶像选秀节目的出品方，爱奇艺这一做法被认为具有风向标作用，当时还有人猜测，其他平台会不会跟进，现在看来，各大卫视、网络平台是否响应已经不重要了，偶像选秀节目彻底退出娱乐舞台已成定局。

这次《通知》提出的八项要求，其中有一些是老问题，比如明星片酬畸高、唯流量论、抵制违法失德明星等，之所以“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成为最引人关注的一个点，在于它雷厉风行地到达了执行层面——相比于控制明星片酬、反对唯流量论、管理违法失德艺人需要更严密的规则与标准，也需要复杂的参照对比体系，“不得播出”这4个字简单直接、一目了然，不存在“阴阳合同”等幕后操作手段，不受其他因素影响，这直接断掉了平台继续制作此类综艺的念头。

综艺节目类型风格多种多样，《通知》仅对“偶像养成类节目”下达了“封杀令”，客观上也表明，此类节目已成为制造各种娱乐乱象的“风暴中心”。回顾过去几年娱乐圈存在的“饭圈文化”“场外打投”“粉丝互撕”“诱导消费”等不良现象，“偶像养成类节目”虽然不是源头，却将上述种种乱象演绎到了极致。从传出这类节目要被严控，到被“封杀”，舆论的反应也证实，多数观众与网民，已经失去了对这类节目的兴趣，同时，对这类节目带来的干扰，也达到了忍耐的极限。

“偶像养成类节目”之所以令人反感，其

关键的点在于“养成”二字。“偶像养成”这一发源自日韩娱乐产业的商业模式，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没有纠正其存在的弄虚作假、洗脑教育等缺陷，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所谓“其极之势”。这类节目播出前后，通常会通过数据造假与商业炒作的方式，给娱乐圈与社交媒体造成很强的“污染”，也带动其他娱乐产品产生了效仿思维，给人留下娱乐圈“乌烟瘴气”的印象。如果这类节目的消失，能换来综艺节目回归正常，乃至娱乐圈回归“作品至上”的价值理念，也算得上“断臂求生”。

“偶像养成类节目”的天生缺陷，使得其制造出来的“偶像”，是苍白无力的，一是缺乏健康的公众形象，二是没有创作的实质支撑。这类偶像“出道”之后，通常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平台与渠道充分利用，压榨出全部商业价值，然后再用新一轮的选秀，进行“产品迭代”。也就是说，平台选出来的“偶像”，也是被他们物化的对象，唯一的用途就是将其变成盈利工具。以“偶像养成”为节目要素的综艺选秀，因此都存在内容“空心化”的状况。

有人担心“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会不会造成综艺萧条的后果，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偶像养成类节目”固然名声在外，但这一类型在庞大的综艺节目内容制作体量中占比并不算高，几大平台每年公布的综艺节目制作名单，通常多达二三十个，没了“偶像养成类节目”，平台依然能够为观众提供大量其他类型风格的综艺，来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

“偶像养成类节目”停播之后，综艺节目会再一次进入“黄昏”吗？这要从17年前的《超级女声》说起。2004年，首届《超级女声》的举办，不但让选秀这一娱乐形式稳固地扎根于人心，也全面刷新了旧的综艺形态，一些诸如“复活”“场外投票”等设计，至今仍被不少综艺节目沿用。

2006年，《超级女声》举办完第三届之后被叫停，理由主要集中于“助长追星陋习”“选手负面新闻不断”“沦为牟利工具”。当时，就有“选秀节目进入黄昏”的说法，但在2018年的《偶像练习生》《创造101》、2019年的《青春有你》等再度成为现象级节目时，选秀节目似乎又进入耀眼的“正午时刻”。



从2004年-2021年，17年间，对比两次选秀节目的走红，会发现一些表面的变化和内在恒定的规律。“超女时代”，主阵地是电视平台，主打的是草根概念，选拔的是个人偶像，诞生了李宇春、张靓颖等实力歌手。而近几年的选秀，主阵地是网络平台，走的是流量路线，选拔的团体偶像，催生出蔡徐坤、李汶翰等有争议的艺人。由电视转战网络，平台的挪移给偶像选秀带来了巨大的生机，但因为核心的利益诉求没有变化，导致网络偶像选秀综艺的“垮塌”，尤其是“饭圈”“出道”“成团”“打投”“C位”“应援”等令人眼花缭乱术语的出现，加快了新一轮选秀的“速朽”。

选秀的本质，应该是选出有实力的艺人，用优秀的作品来证实自己的价值，早期选秀，如《超级女声》《快乐男生》《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等节目推出了不少有实力的选手，正因如此，选秀节目才在“第一次黄昏”的说法产生之后，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但近年的选秀，极度缺乏优质选手，往往成团出道之日，也是被遗忘的开始。“饭圈文化”取代“粉丝文化”，导致非理性追星形成燎原之势，“割韭菜与心甘情愿被割韭菜”，形成了选秀明星背后的平台与受众之间的畸形关系。

选秀形式自进入综艺娱乐形态以来，人为操控一直都是公开的秘密，打着“公平透

明”旗号的规则设定，以及对既定规则的随意修改，主要的诉求就是挑动受众的消费情绪，使其消费欲望不断高涨，直到发生“倒牛奶打投”等触及公众底线的事件发生时，无法克制与约束自身的偶像选秀，亲手把自己送进了自己挖的坑。

从文化层面看，早期的选秀虽有运作上的出格，但没有摆脱大众流行文化的范畴，节目在价值观方面仍有积极能量，对大众心理有一定的迎合与满足；但近年的选秀，把主要的利益诉求建立在“饭圈”的基础上，让“饭圈”这一属于青少年亚文化的奇葩站在了中心位置。失去了大众流行文化的容纳，选秀走上绝路是必然。

当下综艺生态面临诸多问题，比如抄袭、同质化、价值观混乱等，另外“饭圈文化”早已溢出选秀节目，渗透到整个综艺形态中，也出现了一些诸如综艺主持人接受粉丝送礼等不良现象。“偶像养成类节目”的停掉或者说倒掉，也是给综艺生态提了个醒：未来几年，平台与渠道只有真正重新找回综艺节目的价值与意义，才会使这一娱乐形式的生命力得以保存。

和其他娱乐产品一样，通过良性的竞争，才会诞生优质的综艺。“偶像养成类节目”把综艺竞争一度带进难以跳脱的泥坑里。现在“泥坑”没有了，失控的综艺制作，有望能再次回到正轨上来。

西方青年为何如此关注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和碳排放这样的议题，对于西方的青年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一直以来，有不少这方面的活动在持续。在最近的气候峰会期间，也看得到一些西方青年的活动也引起了多方的关注，这方面的相关社会运动也非常活跃。11月5日，以“为未来而战的星期五”为名的活动在COP26“青年日”期间举行，一批青年参与为时3小时的抗议，桑伯格等知名气候人士也将加入示威行列。这些西方青年在这一议题上的活跃变成了重要的因素，也对各国社会形成了相当的影响。

气候变化的议题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问题的核心，这一议题当然具有高度的重要性，也与人类社会的未来息息相关。现在关于气候变化议题已经形成了全球共识，成了一种具有高度价值和意义的全球性

的“政治正确”。而在整个议题的不断地形聚成聚焦的过程中，西方青年的活动是其中的重要的方面。

一方面各界对于这一问题形成的共识，已经被强化为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最重大的世界性的中心议题。这样的议题经过的多年的广泛的发酵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也是具有引领性和时尚性的议题。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极大地影响世界的环保运动，在关于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的话语之下，已经具有了超越过去往往局限在地方性的生活之中的环境保护的具体状况，而已经成为了与人类的未来相关的最高位阶的运动，具有的是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和关键性，也就具有了更大的能量。在文化、媒体、教育、经济等等领域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也形成了一套在

全球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的“碳政治”。而对此议题持有不同看法的势力如特朗普等人已经被视为陈旧保守的顽固派，对于人类的大命运缺少关怀早已被定位为负面的因素。青年是对于世界的未来的“大议题”最为关切的群体，也是受到这些舆论极大的影响的群体。对于这个议题的主流看法对于他们的影响巨大。他们就会对于这一议题有更大的关切。气候变化的议题现在这些年已经压倒了所有人类的具体的危机而成为了笼罩一切的议题，当然成为了青年的焦点。如新冠疫情对于人类的冲击同样巨大，造成的状况是极为现实而紧迫的，但这个议题虽然有关关注，但似乎比起相对远期的气候变化议题来就显得关注度差了许多。西方青年也没有在这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西方的中产青年，在具体的社会议题上，其实是发挥作用有限的。各种社会的具体问题的解决也牵涉到多方面的复杂情况，很难让青年有所发挥，发声的路径其实也受到具体的限制而难以充分展开，也未必能够引起更多的关注，同时这些具体的议题往往分散而多样，往往是地方性的，很难说具有全球的意义，也没有气候变化这样的大议题显得重要和具有全球性，也能够激发年轻人的大关怀和大理想，有其无可争议、没有讨论空间的正当性。而这又是关系到世界的未来，而未来必然是年轻人的，因此于是以年轻人为主力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运动也会相当活跃。西方的青年对此的积极其实也受到了其主流社会的肯定和激励，如桑伯格的运动受到的广泛的鼓励等等，都让这样的活动更为积极。

西方青年的这种关于气候变化的运动，往往还是以批评西方政府作为标志的。这些活动往往批评西方政府“口惠而实不至”、“缺乏主动性”，往往要求比现在西方政府的减排等目标更为激进的目标，

往往以一种为了人类的未来当下的人们应该牺牲的态度，提出更多的激进的主张。而这里的激进的主张，也不会形成对既有结构的冲击，而是以一种理想性的诉求而受到鼓励。西方政府、媒体和公众往往以一种愿意接受，但需要现实化的态度来对待。气候议题也成了凝聚西方青年共识的工具。当然，这些青年的运动，通过西方社会更进一步地“传导”到现在面临相当的减碳压力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同时西方社会也会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指责，形成压力。这种活动的高度的正当性让这些国家所受到的在发展和减碳之间的平衡的挑战是相当巨大的。让在具有需要减碳的共识之下的，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和现实状况的探讨和现实存在关于公平减碳的博弈更少空间。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减碳方面做出了庄严的承诺和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行动，对于人类的减排的努力正在做出重要的贡献。但现实的情况其实也要世界更多地了解。无论从历史的排放到现实的排放，中国从人均看，都远比西方国家排放为少。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化的国家，其制造业的巨大产能的产品大量在西方国家被消费，西方的青年也是消费者，其实在消耗方面也远比中国人为多。中国在减碳方面的努力和付出很大，贡献良多，这种状况其实需要世界更多地了解。对于全球来说，需要让青年在努力追求减排的目标的理想的同时，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也了解这些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付出的努力。在努力追求理想的目标的同时，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的不公平的状况有更多的了解。减排来追求可持续的发展是人类共同的目标，需要共同的努力，当然也需要明确各自的责任，更公平地处理这一重要的问题。